

论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

□ 李 周

[摘要] 本文从整体论的角度分析了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互补的重要性。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作为文明体系中最重要两个维度,前者引发了人类文明第一次质的飞跃,后者引发了人类文明又一次质的飞跃,其他文明是文明体系的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此外,从认识理念、建设理念和投入机制三个角度对我国生态文明实践的进展作了梳理,对培育生态文明的任务和策略作了粗略的思考。最后,讨论了现实中较为重要的三个问题:重视具有乘数效应的公共品;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不宜采用末端治理方式;生态系统不宜走滥用和禁用两个极端。

[关键词] 生态文明;认识理念;建设理念;投入机制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16)04-0005-06

[DOI] 10.13529/j.cnki.enterprise.economy.2016.04.0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市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3AZD07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转移排放、碳关税对中美经济的影响及策略研究——基于CGE模型的实证分析”(项目编号:71273275)

[作者简介] 李 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北京 100732)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lism,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mplementation betwee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wo dimensions of a civilization system. Material civilization leads to the first qualitative leap of human civilization, whil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rings another leap. Other civilizations expand the quantit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 civilization system.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progress in th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three angles: understanding concepts, building concepts and input mechanism, and proposes the mission and strategy to cultivat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inally, it discusses three important questions in practice: pay attention to public goods with multiplier effect, should not use end-of-pipe treatment to treat large-scale livestock pollution, and ecosystems should not take two extremes of abuse and disabled.

Key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nderstanding concepts; building concepts; input mechanism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一)物质文明的重要作用

人类最初面临的是生产不足的问题。从总体上看,食物产出难以满足人类的基本营养需求,这是人类平均寿命一直很短的主要原因。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人类的疾病主要是由营养不良引起的“贫困型”疾病,这同人类进入发达阶段后主要是营养过剩引起的“富贵型”疾病有显著的差异。换言之,此时平均寿命长短与营养水平高低的相关性,要显著高于它与医疗水平高低的相关性。马尔萨斯出版的《人口论》是其根据那个时期农业增长极为缓慢,人口增长

相对快速的史实概括出来的。由于人口的增长快于食物的增长,战争和瘟疫成为协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平衡的手段。马尔萨斯用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产品以算术级数增长来概括该现象,主要是为了便于人们理解这种变化。

生存难以为继的农民累积到一定数量,会以暴力的方式进行土地资源再分配,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不容易理解的是:战争导致人口数量的非正常下降,才是这种零和博弈的做法能够奏效的主要原因。同战争、瘟疫、饥荒相比,节制生育显然是更温和、更理性地协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平衡的手段。就此而言,马尔萨斯开出的“药方”是有道理的。

物质文明是在人类克服上述危机的过程中逐步

形成的。物质文明的推进,解决了生产不足的问题。但是,人类面临的问题并没有因为物质文明的推进而消失。随着生产过剩造成的资源和环境危机的出现,单纯追求物质文明的局限性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来。

(二)刺激消费和财产占有欲望的两重性

在物质文明的第一阶段,人们感受到的是它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的显著作用。所谓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主要是针对物质文明第一阶段而言的。在物质文明的第二阶段,人们感受到的是生产的商品大大超过生理需求的经济危机。虽然这个问题通过商品多样性的创新和促销方式多样性的创新而基本得到解决,但是人们发现,这种依赖过度刺激消费和占有财产的欲望维持的扩大再生产,对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局面不加以扭转,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就会遭受致命的打击,进而威胁人类的生存。应该肯定,刺激消费和财产占有欲望的理念对于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是有效的。然而,最大限度地生产和消费理念的负面影响绝非可以忽略不计。例如,倘若把能种的土地都利用起来,把能满足作物生长的时间都利用起来,把能提高农产品产量的技术都利用起来,就会造成化肥农药的过量投入和水体富营养化等污染,农产品的质量和营养价值就得不到保证,甚至农产品的色香味也得不到保证。这种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的负面影响显然不能被忽略不计。

近年来,我国最为显著的环境问题是被雾霾笼罩的国土面积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浓度越来越高。这种现象说到底还是追求收入和利润的欲望刺激消费和财产占有欲望的理念造成的负面影响。罗马俱乐部的梅多斯等人认为: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生态退化是经济系统无限的扩张力和生态系统有限的承载力冲突加剧的结果。这个结果显然是人类不当的理念、理论和行为造成的。简略地说,该结果是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理念,把产品、知识、资源和自然界都当作商品或交换价值的理论,以及追求收入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消费最大化、财产占有最大化的行为造成的。

在这样的理念、理论和行为的支配下,科学技术成为人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工具以及满足消费和财产占有欲望的工具。追求收入、利润和刺激消

费、财产占有欲望的理念、理论和行为,造成人的生理需求有限性和心理欲望无限性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地球生态系统终将走向恶性循环,导致无法扭转的生态危机。

(三)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互补

要克服现有理念、理论和行为的缺陷,就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使人类的理念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使科学技术成为解放自然和人类的工具;在理论上构建更为完善的文明体系,实现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的互补;制定一个抑制非理性欲望的制度体系,防范人类行为失之偏颇。按照完整的文明理论,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缺一不可,没有物质文明,生态文明就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没有生态文明,物质文明就有可能偏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不是谁主导谁的关系,而是协调得越好互补性就越强的关系。经济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都有局限性,以生态中心论替代经济中心论,实际上是用一种局限性替代另一种局限性。简单地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能力无限性与生产条件有限性的矛盾、心理欲望无限性和生理需求有限性的矛盾,要分别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文明体系创新来加以解决。在文明体系中,物质文明是人类文明第一次质的飞跃,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再一次质的飞跃,其他文明则是文明体系量的扩张和质的改进。

1.生态文明实际上是人类共同接受的理念。从整体论的视域看,理念、理论和行为都有逐步完善的特征。生态文明是我国率先提出来的,世界各国认同的理念同我国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有着很强的相似性。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揭开了人类共同保护环境的序幕,是环境保护运动由民间行为上升到政府行为的标志性事件;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撰写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人类确立共同追求目标的标志性事件;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是人类进入编制可持续发展规划和行动方案阶段的标志性事件。这些年围绕气候变化召开的一系列全球首脑会议,则是人类进入共同落实环保责任阶段的标志性事件。

2.生态问题和经济问题必须统一解决。从整体论的视域看,要确保人类的物质效用需求和生态服务需求都得到满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生态

“共赢”，就必须把它们都控制在适度的水平上，而不能顾此失彼。进一步说，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经济与生态互补共赢的主要举措，是进行环境友好型的体制机制和科学技术创新，而不是设置越来越严的环境标准，制约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否则，环境标准就会演变为全球或地区范围的政治斗争的工具。

3.理性的尺度必须拓展。现实中探讨的主要是个人(或家庭)理性,这种状况同该理性是最基本的理性有关。从整体论的视域看,除个人(或家庭)理性外,还要有社区理性、国家理性和人类理性与之互补。个人(或家庭)理性是人的本能,无需赘言。社区理性是诸如吴仁宝这样的草根精英的追求,他们志在一隅,造福一方。正是他们的努力,维系了社区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国家理性是诸如邓稼先这样的知识精英的追求,他们是国家脊梁和民族灵魂,他们超越家庭和社区的理性以及无我的奉献精神,使大家找到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目标。人类理性是诸如马克思这样的一批国际主义者的追求,他们超越国家的理念,为全人类平等而探索的行为,应该值得世人尊敬。

4.人与自然和谐必须和人际关系和谐统一起来。不难想象,一个人际关系都不和谐的社会,是不可能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从整体论的视域看,人际关系和谐有两层含义:一是当代人在产品和效用的生产和消费上实现自利与利他的统一,任何人都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二是将当代人的和谐拓展到隔代人的和谐,当代人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人与自然和谐的含义是,以尊重自然为宗旨,以人的自觉与自律为准则,将人与自然由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调整为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

5.按需分配是社会再生产不可逾越的底线。在物质产品短缺的欠发达阶段,只能按各人的贡献分配,其中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劳分配。进入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发达阶段后,有可能采用按需分配的办法。人的生理需求是有限的、可度量的、可优化的,人的心理欲望是无限的、不可度量的、不可优化的。所以,任何时候都要把按需生产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能把按需分配曲解为按欲分配。

6.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是实实在在的行动。生态文明建设不应该是一句假话。不能一方面鼓吹生态文明,占领道德高地;一方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导致过度消费(或赢得升迁机会)。生态文明建设不应该是一句大话。讲天人合一的话很容易,做天人合一的事则不容易。倡导生态文明,一项行动比一打纲领重要。生态文明建设不应该是一句空话。要通过组织制度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通过规划和项目,把生态文明建设方案落实到各级政府、各个企业、各个家庭和每个人的行动上。例如,所有人都履行不浪费粮食的义务。

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

1.生态压力加大

(1)森林生态系统。改革初期与1900年相比,我国森林面积减少了3827万公顷,年均减少50.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16.7%下降到12.7%。

(2)草原生态系统。我国草原生态系统退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中期草地退化面积占草地总面积的15%,20世纪90年代该份额增加到50.2%。

(3)湿地生态系统。最近300年,我国围垦湿地1470万公顷,其中1696-1949年围垦497万公顷,1949-1996年围垦973万公顷,最近50年的年均围垦面积是前250年的10倍。

2.发展政策转型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调整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策,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开始成为政府政绩考核的内容。2006年明确提出“三个转变”:由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由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由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经济发展方式先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又从又好又快转向持续健康。

3.投入能力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10多年的时间跨越了短缺经济阶段。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我国以年均约10%的速度快速增长,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已经接近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增强,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保障。

(二)自然保护理念的演进

我国自然保护理念的拓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尚未认知的物种保护

我国的自然保护始于对科学家尚未发现的物种保护。当时认为,人们对生物资源的认识进而对它们的利用是极为有限的。利用野生物种和基因来提高栽培作物的生产力和疾病抵抗力,是科学家必须承担的责任。把这些具有很大潜在价值的物种资源尽可能地保护好,是将上述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必要条件。所以,20世纪50年代的自然保护瞄准的是最有可能发现新物种的生物群落。

2.典型生态系统的保护

研究结果表明,按单位土地面积上的生物量计算,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大于农田的生产力,其主要原因是自然生态系统能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和更有效地利用土壤中的各种营养物质。虽然农业生产采取了技术措施,仍不能像自然生态系统那样“灵活”地适应气候变化和利用光、热、水、土等资源。这意味着自然生态系统为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指明了方向,于是进入了把所有典型生态系统都保护下来的阶段。这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自然保护区数量剧增的主要原因。

3.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自然界里的物种几乎都是功能性物种,成为经济性物种的可能性极小。但物种消失越多,生态系统处于崩溃的风险就越大。所以,功能性物种作为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或缺性,同样具有保护价值,这是20世纪末我国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和退田还湖等重大生态工程的主要理由。

必须指出,自然保护三个阶段的演进是自然保护理念的拓展和完善,而不是自然保护对象取舍的变化。

(三)建设理念的演进

虽然我国经济转型采用的是渐进式改革战略,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发生的变化极为显著,接近于先行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变化。

1.目标优先序的演进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倡导的生产优先目标,仍然

是以牺牲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代价的。笔者在作退耕还林工程中期评估时发现,内蒙古和宁夏的退耕地有些是联产承包后农户开垦的陡坡地。值得庆幸的是,国家意识到生产优先的局限性后,逐渐以生态经济兼顾政策替代了生产优先政策。具体措施包括制定标准化的农业生产工艺,开展耕地、林地和草地永续经营认证,制定无公害、绿色、有机产品标识,以及再生品标识(如铅笔、纸张)等。近年来又开始推行生态优先政策,并通过各种形式的生态补偿方式,将生态优先政策落到实处。

2.生态治理的演进

我国生态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仅采取生态保护类措施,例如,降低森林采伐强度和采伐量、草地放牧强度和放牧量、渔场捕获强度和捕获量,以及设立禁伐期、禁牧期和禁渔期等。尔后增加了生态恢复类措施,例如,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田还湖等重大生态工程。边际农地由几千年来逐渐进入转变为现在的逐渐退出,是我国由资源依赖型的传统农业向技术主导型的现代农业转型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我国农业的生产优先开始被生态优先替代的标志性事件。近年来又增加了生态建设类措施,主要是根据生态学原理和现代科学技术,对受人为活动干扰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和重建,以提高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促进生态系统顺向演替,促进生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3.管理制度的演进

改革初期,我国实行的是生产管理制度,瞄准的是劳动者的安全和消费者的安全。例如,通过锅炉安全管理、矿业生产安全管理和危险品安全管理等,确保劳动者的安全;通过药物和食物等安全管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针对资源消耗过快的问题,制定了确保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管理制度,包括森林不超采、草地不过牧、渔场不滥捕等。近年来又制定了一系列生态管理制度,例如,划定耕地、林地、草地、水资源保护红线,以确保后人的需求。最值得一提的是开始构建生态系统监测体系。现在实施的按面积给予生态补偿的办法,是一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的补偿办法,它不可能对生产经营者产生正向激励。而要扭转这种做法,就要采用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给予生态补偿的办法,必须建立社区群众监测、遥感数据解析、专业人员监测三

位一体的生态系统监测体系。

(四)生态建设投入机制的演进

1.义务劳动制度

我国的生态建设最初采用的是义务劳动制度。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村地区到处都是荒山荒地,为了加快荒山荒地绿化,国家要求各级政府组织农民在农闲季节造林,条件好的地方给予农民少量补贴;在荒山荒地集中连片的地方配置了一批国营林场。为了做好新造林的管护,各地农村设置了社队林场。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至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的政策。

以1981年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为标志,生态建设的义务劳动制度拓展到了全国。截至2011年底,全国参加义务植树人数累计达到133亿人次,义务植树614亿株,折合绿化面积2082万公顷,相当于两个江苏省。

2.生态补偿制度

生态补偿最初采用的是项目补偿制度。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和退牧还草工程采用的都是项目补偿制度。在项目补偿制度下,补偿对象、补偿标准和补偿年限都是特定的,项目期间不会发生变化。项目结束,补偿就结束。

针对项目补偿的局限性,国家又出台了基金补偿制度。公益林采用的是基金补偿制度。该制度下的补偿资金总量会随着财政收入总量的扩大而增长。所以,在基金补偿制度下,补偿的规模和范围是逐渐扩大的,补偿的标准是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提高的。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具有多样性。退耕还林的补偿标准,决定于退耕对农户生产的影响程度。公益林的补偿标准和规模,决定于财政支付能力。改革的取向是根据生态治理的效果给予生态补偿。

3.生态补偿主体

我国负责生态补偿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近年来,参与生态补偿的公益组织逐渐增多,成为新型生态补偿主体。此外,有些国际组织(例如GEF)也在做类似的工作。

三、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展望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含义

生态文明建设,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的庄严承诺,也是实施持续健康发展战略的坚实基础。从国内看,它回应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诉求;从国际看,它表达了作为国际社会重要成员的自觉担当,彰显了中华民族对子孙后代、对世界未来负责的态度。

生态文明建设,包括硬体建设和软体建设。其中,硬体建设是通过生态工程,使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更齐全、更强大,景观格局更丰富、更完美,过程影响更正面、更有力。软体建设是通过生态教育,促成国民对生态文化的认同,促成中华生态文化的传承和繁荣。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要从培养生态意识入手,形成敬畏生态、善待生态的文化氛围和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的行动准则,让江河湖泊通过休养生息重现秀美景色,让森林草地通过生态保护焕发勃勃生机,让生产、生活和生态通过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变得更美好。倡导生态文明建设决不是对经济建设中心论的调整,而是为了纠正现实中片面强调GDP的政绩观。我国在欠发达阶段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不仅会推动国内的生态保护,而且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积极影响。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积累的经验,将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

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结果,也是发展转型的重要标志。人的需求既包括物质产品的需求,也包括清新空气、清洁水源、舒适环境、宜人气候等生态服务的需求。生态文明建设说到底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第一,优化开发格局。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保留更多空间,给农业保留更多良田,为当代人提供舒适生活,为后代人建设美好家园。第二,发展绿色经济。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筑牢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生态之基。第三,保护生态系统。严守耕地、水资源等保护红线,增强生态服务供给能力。第四,加强生态修复。尽快完成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和综合治理,尽可能地借助于生态系统的内在力量促进原有生态功能的恢复,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扰。第五,优化体制机制。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评价体系、考核办法、奖惩

机制;按照代内补偿和代际补偿原则,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第六,培育生态文化。增强国民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新风尚。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策略

国家越过温饱阶段之后,客观上需要把生态建设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议事日程。生态建设必须采取渐进性策略。例如,新造林应选择容易成活的树种,森林景观形成之后,再选择更好的树种更新,这就是新造林和再造林的关系。生态建设必须采取本土化策略,而不能热衷于打造异域风情。大量外来物种的引入,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耗用大量的淡水资源,而且有可能孕育生态风险。生态建设必须采取朴实性策略。要防止追求华丽,打造不具有可复制性样板的倾向。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用于生态建设的资金、水土资源都是有限的。要优先考虑生态建设的普遍性和建设水平的均匀性,尽量选择建设成本低、管护难度小、用地和用水少的生态建设方案,使有限的资源提供更多的生态产品。生态建设必须采取综合性策略。要围绕生态文明这个主题,完善生态建设的法律制度体系、科学技术体系和人文关怀体系。

四、三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看,最重要的工作是协调,例如短期目标(食物安全)和长期目标(环境安全)的协调,显性目标(收入增长)和隐性目标(环境改善)的协调,地上植被建设目标和地下水资源保护目标的协调。现实中的问题几乎都是顾此失彼造成的,例如:从生产、运输、使用三个环节的补贴政策,刺激了化肥的过度生产和消费。因此,在今后的实践中,还应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要重视具有乘数效应的公共品

第一,优先改善所有人都能平等共享的生态系统服务。生态服务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增加生态服务供给,客观上具有改善福利分配的效应。第二,优先改善能给更多人带来便捷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例如,改善飞机这样的私有品的性能节省乘客1小

时时间,需要花费的资金是单架飞机所需资金和飞机数量的乘积;而改善机场到市中心的公共交通系统节省所有乘客1小时时间,所需的是一笔固定的费用。改善飞机这样的私有品的性能节省乘客1小时时间通常是以投入更多的能源为代价的,而改善机场到市中心的公共交通系统节省乘客1小时时间,还有减少能源消耗的效应。第三,扩大私有品开放空间。例如,培育最便捷的汽车租赁市场,将电动汽车像自行车那样配置到每个小区、商业网点、文体活动中心,使大家租用电动汽车像租用自行车那样方便,以满足人们使用汽车的需求替代人们占有汽车的欲望,这样,用于汽车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就会有所减少。一旦电动汽车充电成为一种就业机会,大家使用电动汽车的便利性就提高了。这应该成为社会发展的方向。

(二)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不宜采用末端治理方式

有机肥企业的规模经济要显著大于畜禽养殖企业的规模经济,规模化养殖污染必须采取园区治理的方式,要求畜禽养殖企业以末端治理的方式消除排泄物污染显然是不合适的。

(三)生态系统不宜走滥用和禁用两个极端

以不干预的方式引导生态系统趋向零增长的顶级群落,是自然保护区内生态系统的演替目标。对于绝大多数生态系统,既要保护也要利用,它们是保障生态系统具有较高的年生物量的两类措施。例如,就草地生态系统而言,过度放牧和长期禁牧都会扰乱草原生态系统的演替,造成草原生态系统生产功能的退化。以适当的方式利用和保护生态系统,既是技术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政策研究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 [1]莱斯特·R.布朗.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 [2]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 [3]李周.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永续发展[J].经济研究,2013,(2).
- [4]李周.论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J].鄱阳湖学刊,2014,(3).

[责任编辑:李小明]